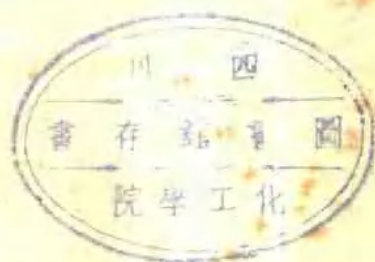


161120

論蘇聯社會主義 經濟建設

中級組 第三冊



人民出版社

28819

1081
V.3C45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中級組 第三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中級組 第三冊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 號

人 民 出 版 社 西南聯合辦事處重印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重慶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537 787×1092毫米·14%印張·251,000字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重慶第一次印刷

印數：1—21,000 定價：9,400元

目 錄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農業集體化而鬥爭（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時期）	一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十一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四〇
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 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八二
斯大林：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 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九二
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二七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三六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時期)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十一章

一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間的國際環境。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經濟危機。

日本強佔東三省。德國法西斯蒂上台執政。兩個戰爭策源地。

蘇聯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方面獲得了重大的成功，並很迅速地發展着工業，而資本主義國家却於一九二九年末爆發了破壞力量空前巨大的世界經濟危機，並在以後三年中間加深起來。工業危機既與農業危機錯綜結合，於是就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狀況更加惡化。

在經濟危機的三年間（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蘇聯工業增長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二九年水準相較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國工業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却降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六十五，英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國工業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這種情形再次顯示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情形表明社會主義國

家是世界上唯一不沾染經濟危機的國家。

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有二千四百萬失業工人陷於飢餓貧困受苦的境地。數千萬農民感受到農業危機的痛苦。

世界經濟危機使帝國主義列強間，戰勝國與戰敗國間，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及附屬國間，工人與資本家間，農民與地主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指出：資產階級將從兩方面尋找逃出經濟危機的出路——一方面是藉建立法西斯專政，即建立資本主義最反動、最激烈沙文主義，最激烈帝國主義分子底專政來鎮壓工人階級，另一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來剝掠防衛能力薄弱的國家。

結果正是如此。

一九三二年，從日本方面加強了戰爭威脅。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看歐洲列強和美國因經濟危機發生而完全忙於內部事務，於是決定乘機來逼迫防衛能力薄弱的中國，企圖把它征服而成為那裏的主宰。日本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向中國宣戰，却狡詐地利用他們親自造成的「地方事件」，像行竊似地把自己的軍隊開進東三省，日本軍隊佔領了東三省全部地區，以便準備方便陣地去侵佔中國北部和進犯蘇聯。日本爲了便於自由行動而退出了國際聯盟，並更其加緊擴充軍備。

這種情形就推動美英法三國去加強它們在遠東方面的海上軍備。日本分明力圖把中國征服，並從這裏把歐美帝國主義列強擡出去。於是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就以加強軍備來對付。

但日本同時又還力圖使佔蘇聯遠東地區。蘇聯當然不能把這種危險置之不顧，於是就來加緊鞏固遠東邊疆一帶的國防能力。

這樣，由於有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國主義者作祟，就在遠東方面形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

經濟危機不僅使資本主義矛盾在遠東方面尖銳化。它並且使這種矛盾在歐洲也尖銳化了。延續的工農業危機，大批工人失業以及貧苦階級生活更加痛苦不堪的事實，使工農不滿情緒日益加強。不滿情緒已轉變成工人階級底革命義憤。不滿情緒特別在德國這一因受戰爭破壞，因付賠款給英法戰勝國以及遭遇經濟危機而弄得經濟上疲竭不堪的國家裏加強起來，因為這裏工人階級遭受着本國和英法資產階級雙重的壓迫。德國共產黨在法西斯蒂上台前最後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六百萬選票，便是最能說明這點的例證，德國資產階級看到，德國當時所保存着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權利可能使它吃到大虧，工人階級可能利用這種自由權利來開展革命運動。因此它便認定，爲了要在德國保持資產階級政權，唯一的手段就是取消資產階級民主權利，把國會化爲烏有，而建立一個能够鎮壓工人階級並在懷有復仇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找到基礎的恐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專政。於是它就叫專爲欺騙人民而自稱爲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法西斯黨來上台執政，因爲它很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黨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最反動最仇視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第二，法西斯黨是個復仇主義色彩最濃厚的黨，巧於引誘千百萬懷有國家主義觀念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在這方面幫了法西斯黨不少的忙，因爲他們用自己的妥協政策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

這就是使德國法西斯蒂能在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權的一些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分析到德國事變時說道：

「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因為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會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式來實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四五頁）（一）

德國法西斯蒂用火燒國會，殘酷鎮壓工人階級，消滅工人階級組織，消滅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權利的行動來開始實現其對內的政策。他們用退出國際聯盟和公開準備爲強迫修改歐洲各國疆界以利於德國的戰爭的行動來開始實現其對外的政策。

這樣，因有德國法西斯蒂作祟，就在歐洲中部形成了第二個戰爭策源地。

蘇聯當然不能把這樣嚴重的事實置之不顧，於是它就來炯然注視着西歐事變底進程，並鞏固其在西方邊境的國防能力。

二 從限制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爲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政策的行爲而鬥爭。

對資本主義成份舉行的全面進攻。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展開的農民大批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是黨和政府過去全部工作底結果。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到能够大宗出產供給農業的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由於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糧食採辦運動時進行過反對富農的堅決鬥爭，由於有逐漸教導農民加入集體經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增長，以及由於有第一批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的優良經驗，結果就準備好了過渡到全盤集體化，整鄉、整區、整府農民一同加入集體農莊的基礎。

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的經過並不是表現於基本農民羣衆簡單而和平加入集體農莊，而是表現於農民羣衆同富農進行鬥爭。實行全盤集體化就是要把全村所有一切土地轉交集體農莊，但當時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還操在富農手中，因此農民便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把富農所有的財產實行沒收，把富農所有的耕畜和機器奪取過來，並要求蘇維埃政權逮捕和驅逐富農。

所以，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

這就是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當時蘇聯已經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剷除富農，擊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這一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來代替他們的生產。

一九二七年間，富農還出產過六億餘普特的糧食，其中當作商品糧食交出的約有一億三千萬普特。當時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能交出的商品糧食還不過三千五百萬普特。一九二九年間，由於布爾什維克黨採取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堅決方針，由於供給農業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的社會主義工業獲得了成功，遂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長成爲極重大的力量。在這一年間，集

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出產了不下四億普特的糧食，其中當作商品糧食交出的已超過一億三千萬普特，即超過富農在一九二七年間所交出的數量。而在一九三〇年間，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應該交出而且確實交出了的商品糧食已達四億餘普特，即已比富農在一九二七年間所交出的數量多得不可比較了。

這樣，由於全國經濟方面階級力量對比的變更，由於已具有必需的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糧食生產，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就能從限制富農的政策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

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實行的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蘇維埃政權曾向富農抽收高度賦稅，曾要求他們按照固定價格出賣糧食給國家，曾以頒佈租地法來相當限制過富農土地使用權，曾以頒佈個體農戶僱傭勞動採用法來限制過富農經濟底範圍。但當時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實行過消滅富農的政策，因為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既容許富農存在，而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又對此給予過相當的保障。這樣的政策結果是使富農分子的增長受到阻礙，使那些經不住這種限制的個別富農階層受到排擠和陷於破產。但這一政策並沒有把富農階級底經濟基礎推翻，並沒有把富農階級消滅。這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而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這政策在一定時期，即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力量尚嫌薄弱而不能用自己的糧食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時期，原是必要的。

在一九二九年年底的時候，因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有充分的增長，於是蘇維埃政權就放棄這個政策而實行了一個急劇的轉變。此時它已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過渡到剷除富農階

級的政策。它廢除了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於是就使富農失去了土地和僱工。它取消了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它允許農民把富農所有的耕畜、機器及其他農具沒收轉交給集體農莊。富農財產被剝奪了。富農財產被剝奪，實與一九一八年資本家在工業方面被剝奪的情形相同，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此時從富農那裏沒收過來的生產資料不是轉歸國家，而是轉歸聯合在一起的農民，即轉歸集體農莊。

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底舊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按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

這個革命底特殊處，就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來提倡，並由反對富農盤剝，爭取自由集體農莊生活的千百萬農民羣衆從下面直接贊助實現的。

這個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問題：

(一) 它把我國人數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支柱的富農階級消滅了。

(二) 它使我國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即農民階級，離開了產生着資本主義成份的個體經濟的道路而轉上了公共集體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

(三) 它在農業這一最廣大和切身必需而又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給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這樣就把國內所有的資本主義復辟辟危險底最後根源消滅下去，而創造了建成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論證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並指明農民全盤集體化羣衆運動底結果時，寫道：

「各國資本家妄想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即『神聖的私有原則』，已在崩潰而化爲灰燼了。他們所認爲是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已紛紛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度』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制度的軌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已在崩潰下去。」（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九六頁）〔三〕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在聯共（布）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過的「論集體化速度與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決議中明文規定了的。這一決議充分估計到蘇聯各個區域條件不同的情形，充分估計到蘇聯各個省區對集體化準備程度不一的情形。

當時規定了各種不同的集體化速度。聯共（布）中央根據集體化速度的標準把蘇聯各省區分成了三類。

歸入第一類的是對集體化最有準備，拖拉機數量較多，國營農場數量較多，並且在過去幾次採辦糧食運動時同富農作鬥爭的經驗較多的那些主要的穀物區，即北高加索（庫班區、頓河區、特勒克區）、伏爾加河中下游區、伏爾加河下游區。對於這一類的穀物區，中央提議要在一九三一年春季把集體化工作大體完成。

第二類所包括的穀物區，即烏克蘭、中央黑土區、西伯利亞、烏拉爾、卡查赫斯坦等穀物區，可能在一九三二年春季把集體化工作大體完成。

其餘各省、邊區及共和國（莫斯科省、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等等），可能把集體化工作完成時間延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終結時期，即延長到一九三三年。

黨中央認為由於集體化速度日益增長的關係，必須加速建築出產拖拉機、收割聯合機以及拖拉機曳引農具等等的工廠。同時，中央認為必須「堅決反對在集體農莊運動現階段上輕視馬匹曳引力作用的偏向，因為這種偏向會引起浪費馬匹和出賣馬匹的現象」。

同時中央又決定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發給集體農莊的貸款增加一倍（增至五億盧布）。同時還決定由國家出資給集體農莊進行土地整理。

在這個決議中給了一個極重要的指示，即認為集體農莊運動在目前階段上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集體化的農業勞動組合。

中央極嚴厲地預告各級黨組織，必須「反對任何自上『號令』集體農莊運動，因為這種辦法可能造成用集體化的兒戲來代替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真正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的危險」（「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六六二頁）。

中央通過這一決議，便把究應如何實現黨在農村中新政策的問題闡明清楚了。

在實行消滅富農和進行全盤集體化這一政策的基礎上，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開展起來。整村整區農民一同加入集體農莊，從道路上掃除富農，擺脫富農盤剝。

可是，在集體化運動方面獲得這樣巨大成功的時候，而在黨工作人員實際工作中却很快就暴露出一些缺點，其表現就是歪曲了黨對於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的政策。有許多黨工作人員不顧中央

已經預告大家不要過分追求集體化底成功，却毫不問地方和時間條件怎樣，不問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準備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強加速集體化。

當時暴露出違背集體農莊運動自願原則的事實。在好幾個區域裏，人們竟用對農民採取「剝奪財產」，棍棒選舉權等等要挾手段強迫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的辦法來代替了自願原則。

在好幾個區域裏，人們竟用官僚主義的號令手段浮報集體農莊數目的辦法，用勉強誇大集體化百分數的辦法來代替了集體化方面的準備工作，來代替了耐心解釋黨在集體化方面政策基礎的工作。

在好幾個地方，人們不顧中央認定集體農莊運動基本環節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公有的農業勞動組合這種指示，公然魯莽從事地跳過勞動組合而逕直組織農業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實行公共化。

有幾個省區裏的領導工作人員因迷戀於集體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違背了中央關於集體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莫斯科省爲了競求浮報的數目字，竟責成該省工作人員必須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完成集體化，雖然他們至少還擁有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底止）。在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一帶，人們更把這一指示違背得粗暴已極。

富農及其應聲蟲就利用這種過火行動來實行挑撥，主張組織公社來代替農業勞動組合，立刻把住房、小牲畜和家禽實行公共化。同時，富農又煽動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前將牲畜宰殺，誘惑農民，硬說牲畜到集體農莊內「橫豎是會被人拿去的」。階級敵人是指望地方組織在集體化運動

中所犯的過火行動和錯誤將會激怒農民，將會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

由於黨組織所犯的錯誤以及階級敵人直接挑撥搗亂的結果，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下半月，雖然集體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已獲得顯然的成功，但在某些區域內却暴露出農民嚴重不滿底危險徵兆。在個別地方，富農及其走狗甚至還煽起過一部分農民來進行直接反蘇維埃的發動。

黨中央接到關於有人歪曲黨路線而勢必使集體化事業受到破壞的警號以後，立刻就來設法糾正，使黨的幹部轉上立刻改正錯誤的道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根據中央決議而公佈了斯大林同志所寫的「勝利衝昏頭腦」一文。在這篇論文裏警告了所有迷戀於集體化成功而陷入嚴重錯誤並離開黨路線的人，警告了一切企圖用行政強迫手段把農民轉入集體農莊道路的人。在這篇論文中特別強調了集體農莊建設底自願原則，並指出在規定集體化速度和方法時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的特殊條件。斯大林同志提醒說，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這種勞動組合只把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業底基本生產資料化為公有，而並不把屋旁園地、住宅、某一部分乳畜、小牲畜和家禽等等化為公有。

斯大林同志底論文發生了極大的政治作用。這篇論文幫助黨組織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給了蘇維埃政權敵人一個極有力的打擊，這些敵人是希望他們能利用這種過火行為來煽動農民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已確信布爾什維克黨路線與某些地方工作人員魯莽從事「左的」過火行動毫不相干。這篇論文使農民羣衆安心下去了。

爲了把斯大林同志底論文所開始的改正過火行動和糾正錯誤的事情貫徹到底，於是聯共（布）

中央就決定再把這些錯誤打擊一下，而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公佈了「反對歪曲我黨集體農莊運動路線」的決議。

在這個決議中，詳細分析了因離開我黨列寧斯大林路線，因直接違反我黨指令而作出的種種錯誤。

中央指出：「左的」過火行為乃是直接幫助階級敵人的一種舉動。

中央提議：「把那些不善於或不願意堅決反對歪曲黨路線的工作者撤職，而用其他的工作者代之。」（「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六六三頁）

中央把幾個犯了政治錯誤而又不善於改正錯誤的省黨組織和邊區黨組織（莫斯科省、南高加索）底領導成份革新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公佈了斯大林同志所寫的「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一文。這篇論文上指出，在農民問題上所犯的種種錯誤底根源，以及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所犯的主要錯誤是：不正確地對待了中農，在建設集體農莊時違背了列寧所規定的自願原則；違背了列寧認定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特殊條件的原則，公然跳過勞動組合而逕直成立公社。

由於實行這一切辦法的結果，於是黨就把許多區域內的地方工作人員所犯的過火行為克服了。

只是因為中央具有極堅決的精神和逆流而進的本領，才把黨內頗大一部分因迷戀勝利而離開黨路線往下飛奔的幹部及時引上了正軌。

黨把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行爲克服了。

結果就把集體農莊運動底成功鞏固了。

結果就爲集體農莊運動更進一步的強大發展造成了基礎。

在黨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以前，以反對資本主義成份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爲目的的嚴重進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在工業方面進行的。當時農業，農村，在這方面還落後於工業，還落後於城市。因此，當時的進攻還是一種片面性的進攻，不是全面進攻，不是總進攻。現在農村底落後性已開始成爲過去，農民爲消滅富農而進行的鬥爭已表現得十分明顯，黨已進到了消滅富農的政策，所以反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就成了總的進攻，片面的進攻就轉變成了全面的進攻。到召集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對資本主義成份實行的總進攻，已經全面開展起來了。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開幕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總共代表着一百二十六萬零八百七十四個黨員和七十一萬一千六百零九個候補黨員。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爲「社會主義全面開展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斯大林語）載入我黨史冊的。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作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中，指出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開展社會主義進攻時所達到的重大成功。

在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方面，已使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出產總量中的比重超過了農業比重。在